

中華古籍文化系列

漢寶德 著
吳曉敏 圖

風水與環境



天津古籍出版社

風水與環境

漢寶德 著 吳曉敏 圖



A1060410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水与环境/汉宝德著;吴晓敏绘.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3. 1

(中华天古文化系列/董令生主编)

ISBN 7 - 80504 - 933 - 5

I. 风... II. ①汉... ②吴... III. 风水—研究
IV. B99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3984 号

风 水 与 环 境

汉宝德等/著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天津市恒远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25 字数 160000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7 - 80504 - 933 - 5

定 价: 18.00 元

风水是中国通俗文化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它代表中国人对自然的看法,自明代以来,已成为中国的建筑原则,今天建筑家认为功能的部分,也都和风水息息相关。因此,研究风水,可增进我们对民族文化、行为模式的了解。

基于实务上的接触与研究结果,作者认为,风水是一个很有用的观念,而研究风水禁忌,更可以了解中国人对环境的看法,在力求合乎环境计划或科学原则之外,也能在自然与民俗文化中寻得平衡。

序

1968年我回台湾担任东海大学建筑系的系主任,同时开始设计几座小型的建筑,主要是住宅。这些住宅的业主是家岳父的朋友,我以哈佛毕业生的身份设计小住宅,自觉是牛刀小试。但是却使我感觉到要用西方建筑的学理或创造性形式来打动他们,实在是太困难了。他们是成功的官员或商人,有自己的一套看法,要他们尊重建筑或建筑师都太无可能了。

这是我开始了解建筑是一种文化现象的时候。我开始感到,如果建筑是一种艺术,也属于通俗的艺术。

就在那几年,我为一位长辈所建的住宅,被他的朋友指为风水不佳。这是非常尴尬的情形。家岳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特别请了风水先生去化解。最后虽然勉强通过,对我的影响是持久的。我知道只了解建筑是文化现象还不够,还要明确的知道这些文化现象的具体内容。我决心下一点功夫去研究风水。

为了请风水先生现身说法,我申请了东海大学的研究费,就在授课、系务行政与建筑业务的繁忙生活中,分出些时间进行对风水的研究,读了些古书,我对所谓风水有了初步的认识。东海的研究费花完了,但文章却没有缴卷,直到离开东

海,研究的成果才消化,这时候台大城乡所出学报,我就把初步的成果交他们发表。这就是《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这篇文章的来源。

发表了这篇文章后,我就把研究风水的方向转到更具体的风水禁忌方面。我觉得风水成为中国通俗文化的一部分,主要在禁忌上面。这些禁忌怎么流传、演变,可能代表些什么意思都是我所关心的课题。

研究禁忌恰巧是对古代风水书上图解的研究。这要花很多时间,不但要读通,还要用现代的图样表现出来。就由路芃芃小姐负责把我的草图画为正式图样,并加以整理。这些图样选自几本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的风水著作。写完后,依然交台大城乡所学报发表。

转眼间这两篇文章出版已有十多年了。回顾十几年前在我研究风水的这段时期,也就是博物馆生涯之前的我生命中最惶惑的时期。此时先室萧中行女士为了孩子的教育在美国居住数年,是我看到她一生中眼泪最多的阶段。今天结集出版,使我回忆她每次与我离别时的伤感,在机场留我到最后一分钟的情景。

两篇文章虽已出版了十几年,风水的研究似乎仍在发轫的阶段,对后来的研究者仍有参考价值。希望这个小册子的呈现可以使我写出许久以来就打算出版的第三篇。

汉宝德

1996年秋于台南官田

目 录

序	1
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念架构	1
前言	1
我国士人对风水的态度	6
风水的古与今	19
峦头——自然的概念架构	37
天象的缩影——易卦与数理	60
注释	112
风水宅法中禁忌的研究	130
研究宅法禁忌之意义	132
研究的方法	137
《阳宅十书》中的禁忌	143
《重校正地理新书》中的禁忌	148
《阳宅大全》中的禁忌	152
《八宅明镜》中之禁忌	157

《阴阳地理风水全集》中之禁忌	161
宅法禁忌的分类	165
轮廓形的吉凶	165
形状意会的吉凶	169
与格局有关的吉凶	172
结论	175
注释	178
 图录参考书目	 188
 附录：阳宅内形·外形吉凶表	 189
说明	189
分类目录	190
内形——建筑之配置·形式·构造	193
外形——环境	209

前 言

我国自现代教育制度实施以来,风水就被认定为一种迷信,一种进步的障碍,因此不被视为可以传授的知识。受现代教育的青年,包括建筑师内,对风水一无所知是很当然的。所以风水是现代化过程中被牺牲的我国传统观念的一部分。

我对风水发生兴趣是基于两个理由——其一,1968年,我为一位长辈设计一座私宅,落成后,受到风水问题的困扰。开始时觉得只是一个笑话,发展的情形使我觉得这是深植年长的高级知识分子内心的强固的观念。在开始执行业务的初期,曾以不同的方式遇到业主对风水条件的要求,使我肯定了一个事实:即风水仍然是活在我们民间的**信仰**。官方虽然认定其为迷信,官员们私下也是相信的。因此使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的建筑师而不了解风水,不仅不够资格,而且不免困扰。我开始有了研究风水的动机。

其二,对于中国人的环境观念,我有很浓厚的兴趣。1960年左右,我对这个问题已有了大体的轮廓^②。风水既然是活在现代中国社会中的一种观念,就是不得不弄明白的一门学问。自古以来,风水是构成我们民族思想形态的一部分,在国人传统行为模式与生活观念里占有重要地位。自民族文化学的观点,这已经不是迷信的问题,是我们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对台湾传统建筑的研究也不时遇到风水上的问题。风水通常用来解释很多不能了解的做法,使我发现不但不能帮助了解古老的建筑,而且是一种搪塞的借口。对于一个认真的研究者,不了解风水是很严重的知识性障碍,几乎与研究英国文学不能通英文一样。

实际上使我能够进行这一研究,乃因东海大学在纽约的联合董事会的协助。说起来这就是拜美国人的“中国热”所赐。在当时国际人士对中国文化及其成就甚为惊讶。针灸疗术的成功使外国人对中国一切神秘古老的异术都感到兴趣,而认为有研究的必要。李约瑟的大部头《中国文明与科学》也大约出齐了。在这种氛围下,基督教的组织出钱支助异教迷信的研究就可以解释了。实际上,在国外的中国学者不少对风水的研究有兴趣,只是因为时、空的限制无法进行而已^③。

何以风水对中国建筑传统的研究有不可缺少的重要性呢?因为自明代以来^④,风水实际上是中国的建筑原则,风水先生实际上是中国的建筑师。匠人们负责修造,是工程师与装修家,也要符合与星象有关的尺法寸法^⑤。但与生活环境

有关的重要的决定,却是风水先生负责安排的。如建筑的方位与朝向,开门安灶与定床位等,今天的建筑家认为功能的部分都与风水有关。见图1

诚然,中国人的建筑并非都是风水先生决定的;而今天的房子也不完全是建筑师设计的。可是或多或少,房子的主人总风闻一些风水的原则。即使他不懂,熟练的匠人大多可以提供一些免费的忠告。这种情形与今天的营造厂商或包工向业主以建筑家身份进言被接受是同样的。风水先生们互相指责、批评的情形与今日建筑师相轻的现象亦大同小异。但是今天研究风水,不能期望使之成为一套有用的学问。有用,是的,但只限于对民族文化、行为模式了解的一面,而不是职业性的一面。我们把它自紊乱的发展中找出一个系统,但很难找出它在这一系统之外与科学、技术连上怎样的关系。

我们也许会期望自此一研究中得到一些环境计划或设计中合乎科学的原则,但自一套迷信或前科学的系统中找科学的原理,自不合逻辑的推理过程中找合理的原则是需要很多罗织与附会的。这是很时髦的想法,如同东京工业大学的清家清教授所写的《家相术》^⑥,把风水上的一些说法归之于实证的观点,大多是附会的,禁不起严格的科学的考验。

当然,这不证明风水完全不可能有科学的基础,针灸到今天虽找不到科学的依据,其灵验是无可否认的。今天的科学家至少有不排拒的雅量,即古人所说,“知之为之,不知为不知”,也许我们的科学仍未发展到可以了解针灸的程度。我们不能向针灸挑战,因此也很难向风水挑战。



图1 《书经图说》中的《太保相宅图》 反映周初选址规划成洛邑时“体国经野、辨方正位”的活动，即“卜食洛邑”、“攻位洛汭”。

但是自一个研究者的立场着眼,对于风水之类非理性的推论系统,也许可以容忍其不合科学原则,却必须自效验中求得证实。针灸已为大家所接受,即因对某些部位的治疗,有屡试不爽的效果。而在风水的研究上,最遗憾的是,找不到这种灵验的证据。

我们遇到的几位地理行家及所读到的几十本风水书作者,都是笃信风水的灵验性的,他们大都能自经验中建立信念。过去的著作者尤多表示曾遍走大江南北,覆验名坟。他们在理论与方法上虽各持一说,但却能言之凿凿。因为风水的效果不能立竿见影,信念是非常重要的。

就我个人所接触的风水师的说法,风水的效果只能以信念解释之。我听到很多风水灵验的例证,但若自严格的逻辑去衡量,大多只能视为附会。所以不论多严肃的风水师,总予人某种江湖术士的味道。我所说乃基于信念者,因为笃信宗教者乃以同样态度对神意与预言的解释予以采信。

就我个人的了解,风水是一个很有用的观念,以了解我国人对环境的看法。我们自以为是爱好自然的民族,也被外人认为系爱好自然的民族;风水是我们对自然的看法。

我国士人对风水的态度

研究中国读书人对风水的态度是很有趣的。因为孔门的哲学不接受迷信，“子不语怪、力、乱、神”是儒者所持有的态度，也是中国古典的人文主义的基本精神。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风水这种神秘的自然观是怎样流行起来，终于成为中国人思想的一部分的呢？

在《古今图书集成》中介绍了几篇古来读书人对风水观念的论辩，大体上反映了士人三种不同的态度，即反对派、赞同派与骑墙派。

先说说骑墙派。这一派人恐怕占有士人中的大多数，具有代表性的言论，可以晋嵇康的《难宅无吉凶摄生论》为例。^⑦嵇康是当时的名士，为竹林七贤之首，思想很杂乱，儒、道、阴阳无所不包。骑墙派大多是持有怀疑论的，他们既不能相信吉凶可以宅相来决定，也不相信儒家用以劝世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观念。他们实代表了标准士人的理性主义的精神，既不轻信，也不排除其可能性。

首先他们不十分相信命运。嵇康说：

应曰：“此为命有所定，寿有所在；祸不可以智逃，福不可以

力致。吴布晨痛，卒罹刀锯，亚夫忌饗，终有饿患，万物万事，凡所遭遇，无非相命。”然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长平之卒，命何同短？此吾之所疑也。^⑧

他们对于能否取信，要有证验才成。大多数的读书人自古以来就是实证主义者，嵇康是很典型的代表。

药之已病，其验又见，故君子信之。

宅之凶吉，其报贖远，故君子疑之。^⑨

可是他们只能“疑”，不能否定。因为否定一件不能证实为妄的事情，也不合乎一切取决于证据的原则。不能证实的可“姑妄听之”，不置可否。因为他们知道在他们知识范围之外的事实在太多了。这一点，他们的态度远较西方的实证主义者为合理，也就是基于这样的心理，中国的知识分子才具有包容性，吸纳了外来的宗教思想，嵇康把这种存疑的心理说得非常动人：

吾见沟渎，不疑江海之大；睹丘陵，则知有泰山之高也。若守药则弃宅，见交则非贖，是海人所以终身无山，山客日无大鱼也。论曰：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不可妄论也。^⑩

吾怯于专断，进不敢定福祸于卜相，退不敢谓家无吉凶也。^⑪

正因为大多数的读书人持有这种态度，对于自阴阳五行家发展出来，流行于民间的堪輿术，虽不能说受到知识分子的欢迎，至少不曾受到他们极力的排斥。而实际上大家都像嵇康一样，默默的接受了。即使是在思想上较嵇康更为纯粹的

儒者，同样可以接受，因为孔子所交待的，对于怪、力、乱、神，只是不加理会，不予追究而已，并不必要反对。因此儒家思想本身就有兼容并蓄的精神。

那么为什么有些读书人会反对风水呢？

反对的立场有两类，第一类乃是理性主义的怀疑论者。他们不同于嵇康者，不过在态度上不愿保留而已。不愿保留的原因则着眼于迷信对于统治者有甚大的影响，使他们不务实、不爱民，在政治上避重就轻，并可借辞推脱责任。这些人以战国时代乱世的儒者为主，因为他们亲见古典卜筮被滥用，而生民受涂炭的情况，不免对支持卜筮的正统儒家提出异议。最有力的一段文字是荀子写的，他说：

星坠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虽无一至者，无益也。^⑫

荀子在同章中提到治乱与天象毫无关系，因为天象变化在禹时与桀时同，足证其无关^⑬。这是对正统派的演说家思想的一种反抗。同样的意见，亦见于非常理性，而带功利主义色彩的韩非子。韩非把“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物祭祀”看做亡国之征。^⑭

风水之术到了汉朝一定是相当发达了。所以东汉时的王充在其《论衡》中数次予以攻击。王充的这几段文字，不但使我们了解当时流行的程度，而且可自其中看到当时风水术的

点滴。他们提出的几点都是有关阳宅的。

李约瑟数赞王充为一怀疑主义者，是汉代有科学头脑的人^⑮。这样的一位思想家，对宅相术自然是不能容忍的。他所提出的诘难，并没有什么深刻的理论，也没有与政治连在一起，只是简单而直截了当的常识判断，与今天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完全相同。

比如宅相中很重门之方向，他就会问为什么门特别重要，堂与厅竟不重要。又如五行中的南方火之说，他会问，火都自南方来吗？再如太岁不可相“冲”之说，他会说：“王者之位在上中也，东方之民张弓西射，人不谓之射王……”^⑯

这类问题看上去很简单，用简单的常识去推翻一套迷信的系统，是很不容易的，只要看明清以来的士人如何被牢牢的套在这系统之内，就可知道观念上的枷锁是多严重的思想障碍了。

到了唐朝以后，风水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但仍然不时有些读书人对它发生怀疑，而且著论批评。唐朝的博士吕才，看到当时阴阳之术为巫者利用以牟利，“……遂使《葬书》一术，乃有百二十家，如使吉凶，拘而多忌”^⑰。照他的说法，风水之所以大为流行，竟是因为术者借着大众的迷信，因牟利而滥造了的。《葬书》今天认系晋郭璞之著作，当时竟有“百二十家”，几乎是一个大骗局。新、旧《唐书·艺文志》中，有关堪舆的著作不过十余种，这些“家”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了。

唐代以后反对风水的论调，与汉代以前大不相同。古代是自纯理性反迷信的，只证明其不合理而已足。但唐代以来，